

巴黎公社与中国

陈叔平 著

DB08/1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巴黎公社与中国

陈叔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7.75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85 000 墨数: 1-2 000

ISBN7-300-00379-2

K·42 定价: 2.40元

前 言

在这里只想说明几点：第一，巴黎公社在欧美各国的反响，国外早在60年代初就已出现了系统的成果，从而为巴黎公社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本书则是为了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可是，由于涉及前后100多年的史料，空白实填不胜填，虽已耗时多年，仍感漏洞百出，只好先补上这一块再说。第二，编著这样一本书，难免要碰到许许多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本人力求作出正面回答，不加回避。不同认识，希望能秉着“双百方针”的精神来探求解决。第三，本著的阶段成果，已于五年前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集体编著的《巴黎公社史》一书中，即该书第十章。现在回过头来看，需要修订之处，比比皆是。因此，我也希望读者们不要把本书的论述作为定论来看。相信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和认识的不断提高，肯定还会有改动和补充的余地。如最近清人崇厚的日记已被发现，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补充进来，只好等到再版时再修订。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鼓励和帮助。无论是一点建议、一则史料、一条线索，都使作者受益不浅。借此机会，谨向以下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黎澍、吴亮平、张仲实、张芝联、端木正、胡华、薛汉伟、高放、丁守和、谢筱迺、钟叔河、张展舒、史南飞、朱希淦、武继忠、马志卿、张复、张泽、周友光、刘宝玉、徐瑞芝。

陈叔平

一九八七年九月

目 录

前 言	I
第一章 晚清时期中国人对巴黎公社的评介	1
第一节 清人对普法战争的观感与评介	1
一、志刚和孙家谷的见闻录	1
二、张德彝的《三述奇》一书中的记录	6
三、《中国教会新报》和王韬的评介	13
第二节 对张德彝的《三述奇》一书中有关巴黎公社的 记载的述评	21
一、对《三述奇》中有关巴黎公社的记录的述评	21
二、对《三述奇》中有关战后巴黎的记载的述评	33
三、对《三述奇》一书的再评价	39
第三节 《中国教会新报》对巴黎公社的报导和王韬著 作中的论述	42
一、《中国教会新报》的报导	42
二、王韬在《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中对巴黎公社 的论述	50
第四节 资产阶级民主派时论对巴黎公社的评介	61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巴黎公社的宣传和纪念	66
第一节 共产主义者早期对巴黎公社的评述和介绍	67
一、共产主义者早期的评述	67
二、李大钊的纪念文章——《1871年巴黎“康妙恩”》	70

第二节	中国人民第一次隆重纪念巴黎公社·····	73
	一、1926年广州各界隆重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	73
	二、张太雷的报告——《巴黎公社纪念日》·····	80
	三、毛泽东的讲演——《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	83
第三节	纪念两个“三一八”·····	88
	一、北京“三一八”惨案·····	88
	二、纪念北京“三一八”惨案一周年和巴黎公社五十六周年·····	90
	三、中国共产党“东京特支”的一次纪念活动·····	100
第四节	1927年广州起义（广州公社）·····	102
	一、广州起义的历史背景及其与巴黎公社相似之处·····	102
	二、联系巴黎公社来评价广州起义·····	103
	三、王明的教条主义的总结·····	105
	四、“广州公社”名称考辨·····	107
第五节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宣传纪念巴黎公社的活动·····	112
	一、本时期宣传纪念活动的主要特点·····	112
	二、在“巴黎公社节”开幕的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	113
	三、对中国“国防政府”的揭露·····	117
	四、纪念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和北京“三一八”惨案七周年·····	119
	五、纪念巴黎公社六十三周年。诗篇——《一颗慧星》·····	123
	六、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对巴黎公社的纪念和宣传·····	126
第六节	抗日战争时期纪念和宣传巴黎公社的情况·····	132
	一、本时期纪念宣传活动的的主要内容·····	132
	二、抗日战争头三年纪念宣传活动概况·····	133
	三、在两个“三一八”精神的鼓舞下晋东南青年救国会的成立·····	139

四、1940年纪念两个“三一八”活动的特点·····	141
五、为纪念巴黎公社七十周年而发表的季米特洛夫的文章。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对该文的删节·····	144
六、抗日战争最后几年的宣传内容——声援法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及其他·····	147
第七节 学术著作与译著简介·····	153
第八节 《国际歌》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164
第三章 社会主义时期对巴黎公社的宣传和研究 ·····	172
第一节 建国以来宣传和研究巴黎公社的概况·····	173
一、初期的成果·····	173
二、收获较大的时期·····	177
三、十年内乱时期·····	184
四、新时期的新进展·····	187
第二节 对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探讨的若干问题的评介·····	198
一、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群众运动的态度·····	199
二、怎样看待巴黎公社的废除高薪特权的措施·····	208
三、如何认识巴黎公社革命和政权的性质·····	213
四、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219
五、如何认识和学习巴黎公社民主制的经验·····	226
结束语·····	233

第一章

晚清时期中国人对巴黎公社的评介

普法战争爆发和巴黎公社起义的时候，中国正值晚清同治九、十年间。清皇朝统治的鼎盛时期早已过去，国家正遭受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清政府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对内加紧镇压革命，对外实行奴颜婢膝的卖国政策，后来也有人企图搞些改良。但是，这一切都挽救不了它的覆灭的命运。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闭塞和地理位置的遥隔，巴黎公社事件无法在中国引起类似当时在西方国家所出现的那种反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一些外交官员留下的见闻录和发表在书籍报刊上的评介。这些罕见的材料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般观感，也反映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态度。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有关巴黎公社的评介上，可以明显地看出维护帝制的改良主义者和鼓吹革命的旧民主主义者之间的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态度。

第一节 清人对普法战争的观感与评介

一、志刚和孙家谷的见闻录

巴黎公社起义是在普法战争所形成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爆发的。因此，我们在考察当时中国人对巴黎公社的认识之前，有必要首先看看他们对于普法战争的观感和评介。

在普法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恰好有一个外交使团到巴黎，

它的成员就这次战争发表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见闻和观感。

1868年，清政府向欧美各国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由志刚、孙家谷和蒲安臣等组成。^①这个使团在历时三年，访问欧美11国期间，曾数次出入巴黎。同治九年七月（1870年8月）最后一次到巴黎时，普法战争已经爆发。孙家谷在《使西书略》中写道：

“七月初又回法都，复值布（普鲁士）与法哄，危邦不可久居。亟觅归槎，于八月初旬东驶。”^②战争的爆发，促使他们赶紧回国。

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简略地记述了有关普法战争的见闻：

“十七日（同治九年七月十七日，公历1870年8月13日）晚，至巴里（巴黎）客寓……连日新闻纸传布法交兵之事。时见军营载回伤病死亡者，络绎于道。巴里戒严，时刻征兵集饷。至并罗马保护教士之戍卒，亦调往军营。”^③

“二十六日（七月二十六日，公历1870年8月22日），闻布法交战，法人三战三北。布人复分兵绕道，而攻法之沙陇，为法都咽喉，距城三四百里。再进，则各铁道拆毁，路断行人矣。”^④

志刚一行于八月初一（1870年8月27日）离开巴黎，前往马赛候船回国。离马赛回国当天，传来路易·波拿巴兵败被俘的消息。

① 志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孙家谷，礼部郎中；蒲安臣，1861—1867年间美国驻华公使，当时业已卸任，准备回国，应清政府的聘请当使臣，在出使过程中病死在俄京彼得堡。

② 孙家谷：《使西书略》，第2页，见志刚：《初使泰西记》（附录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本书自此页后所引原文中插入的括号文字说明，均为我所加。凡原书中原有括号文字，则加按语说明。

③ 同上，第119—120页。

④ 志刚：《初使泰西记》，第120页。

息，志刚记录了这件事：“初九日（八月初九日，即1870年9月4日），街巷张告示，言布、法交战，法君那波仑（路易·波拿巴）并兵四万余被擒，大将马克孟（麦克马洪）伤亡。缘法军被攻甚急，弃兵不战。布人径入法军，掳去人卒四万，大炮五百，群子转肚炮七十，遂将那波仑携去。”①

刚回上海，他又就法国国内形势写道：

“法都人士，就势逐其君、后、太子出境。国事抢攘，讫无定局……近闻布兵已围法都，而法人犹与相持，未知作何了局。”②

志刚对于普法战争本身的记述虽十分简略，然而他在观察这场战争的成败原因时，却能联系双方国内政治情况进行分析。

他对普鲁士的分析是：“布路司窃管子作内政，寄军令之法，招携诸侯，远交近攻，与法人战。不旬日而十数万众皆集于边境，器械刳茭咸备。法人三战三北，困于沙陇。”③

对于第二帝国的分析比较具体。他就法军败北的原因写道：

“若论法人之势，尚不至此。惟因从前法都屡次内讧，皆由那波仑任用私党，不听公论。久假不归，而私党为之腴民养兵，借兵挟民，民心不服，而军心因之不固，故布人乘之。急则弃兵不战，而大事去矣。始以奸谋自利者，卒之为法自毙。孟子谓‘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盖惟势利是图，而不肯衷诸道。及至人心不附，而势利安在哉？”④

志刚在指出“民心不服，而军心因之不固”这个因素后，进一步分析了第二帝国腐败的政治制度及其后果：

“法兰西夸诈相尚，政以贿成，其君初以公举，四年为期。

① 志刚：《初使泰西记》，第122页。

② 同上，第131页。

③ 同上，第130页。

④ 同上，第122页。

其间剥民养兵，广置私人。及期应代，则私人借兵挟民，保留十年。其间加税愈重，养兵愈多，货物愈贵。而作苦之人终岁勤动，不得暖饱。皆已觉其剥民养兵，借兵挟民之奸。又及期则久假不归，于是国人连年聚哄。适与布人有隙。民会公称，战则留兵，不战则去兵，否则民不堪命。法君迫于烦言，乃集兵出战。战则军实不敷，盖久为私人所侵矣。诸将复互相忌嫉，卒至覆军杀将，国君被执。初得意于诈力者，究自败于诈力。天理人心之可验，有如此者。”^①

这段分析，具体事实尚欠准确，而且最后归结为“天理人心”的验证，是不科学的。但是这位观察者毕竟指出了第二帝国统治的腐败，军队的庞大，劳动人民的疾苦，以及路易·波拿巴迫于国内矛盾的加深而从事军事冒险等因素，这些分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比较客观的，具有一定的观察力。

志刚一行出使期间，在巴黎逗留时间最长，因此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观察比较细致，能够透过表面的繁荣现象看到一些弊病。孙家谷对于当时的法国作了如下评述：“法人喜夸诈，急功利，市廛繁富，甲于欧洲。其君又专以诈伪交邻国、愚黔首。”^②寥寥数语，颇有奇中。

志刚认为，普法战争有经验可以借鉴。他说：“法人内讧，布人兴师，可为西国殷鉴。不但横而观之天下，即纵而观之古今，不过如是。”^③因此，他回国后，当有人问他，跑了那么多国家，外国人的意图了解到没有？他回答说：“不必问各国之意如何，但自问立意如何，则各国之意，概可知矣。”^④他还引证孙子的“败军引胜”和孟子的“祸福无不自求之者”这两句话，来

① 志刚：《初使泰西记》，第130页。

② 同上，附录一：《使西书略》，第1页。

③④ 同上，第132页。

论证自己的观点，强调贵在自己如何去做。这种观点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是不可多得的。当然，对于志刚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对当时法国历史现象作出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解释的。

志刚一行在法国时，天津教案^①的消息就已传到巴黎。有人在那里煽起一股反华情绪。法国代理外交大臣对志刚等人表明：“天津一事未能办结，中国虽有钦使前来，法国亦不愿接待。”^②

这里所提到的钦使，是清政府准备派往法国充当谢罪专使的崇厚。^③经过一番安排，崇厚一行便成为紧接着志刚前往法国的第二个代表团，这样也就使得中国有另一批人亲眼看到当时法国事态的发展。

① 天津教案发生在1870年6月。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其宗教机构从事侵略活动，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怨恨。导火线则是天津的法国天主教育婴堂弃出大量死婴，而当地又不断发生迷拐幼童事件，诸多牵连教会。当群众起来抗议时，法国领事丰大业、秘书西蒙举止蛮横，恃势逼迫地方官员弹压群众，甚至枪击我官员和人群。群众怒不可遏，采取行动，导致殴毙丰大业和西蒙，火烧望海楼法国教堂、育婴堂、法领事署及英美教堂等事件。法、俄、英、美等七国旋即提出抗议，并派出军舰至海口、烟台一带进行恫吓。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极力讨好外国侵略者。负责查办此案的曾国藩、李鸿章，虽然明知“曲在洋人”，却不惜杀民以谢敌，赔偿巨款，并派谢罪专使前往法京赔礼道歉。

② 志刚：《初使泰西记》，第120页。

③ 崇厚从咸丰十一年起任三口通商大臣，同治元年以兵部侍郎参直隶军事（见《清史稿》第41册〈传〉，中华书局出版，第12476页）。天津教案发生时，他跟法国领事丰大业进行交涉，竟被对方连击两枪，未中。清朝统治者认为“崇厚办理通商事务不能绥靖地方……以致酿成巨案，……咎无可辞……先行交部议处”（见《上谕曾国藩查办天津之案》，录自同治九年六月十八日（1870年7月16日）《中国教会新报》第95卷第222页）。同时“命其为钦差往法国驻劄”（同上，第220页）。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派崇厚去当谢罪专使最为合适。

二、张德彝的《三述奇》一书中的记录

在崇厚的随员中，有一位名叫张德彝^①的，他把这次出使的见闻，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叫《三述奇》^②，其中对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都作了记述，这是当时中国人所留下的有关这两个历史事件的比较完整的材料。

张德彝对普法战争的记述是对志刚的记述的很好补充。志刚的记述可以算作一种评论，对史实本身的记述很少，而张德彝则恰好相反，他对史实比较注意，而评论则不很多。

崇厚一行出国所乘轮船驶至烟台海面时，恰好遇到志刚一行所乘搭的轮船，张德彝奉崇厚之命驾小舟去拜谒志刚等人。按常情来推断，张德彝是不会不向归国人员了解出使国的情况的。

张德彝于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五日（1871年1月25日）抵马赛。这时候，普法战争已告尾声，停战协定行将签定。在当天的日记里，他便对普法战争作了补记，洋洋数千言，从“构衅之由”一

① 张德彝（1847—1918），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同文馆出身，历任译官、秘书、参赞直至出使英、意、比国大臣，还当过光绪皇帝的英语教师。

② 张德彝从1866年开始多次出国，根据他在国外的见闻写下《航海述奇》多部。《三述奇》记录的是他第三次出国的见闻。这次他是以使团的英语翻译、“兵部候补员外郎”的身份随同崇厚出使的。《三述奇》及其他《述奇》由张氏后人于解放初期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收藏在张德彝出生地附近的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书号为地⁹⁸⁰_{897—3}，共8卷。几年前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在该社编辑钟叔河以及北京图书馆有关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将该书发掘出来，为我国史学研究作了贡献。《三述奇》以《随使法国记（三述奇）》书名于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章注码中带〔〕号者，为新书页码。

直写到抵法当天听到的“巴里城内……廷臣集议，欲往德营乞和”，俨然是一篇普法战争大事记^①，其详尽是志刚的记述所难以相比的。张德彝虽然说《三述奇》一书“系逐日登记，藉驱睡魔”，但从这一天的日记内容看，显然是事先根据有关资料来源进行归纳整理，经过精心编排后，再安插到这一天日记中来的，可使人了解战争发展过程的概貌。这篇承前启后的日记，显示了张德彝的编史才能。

张德彝在日记中首先分析了普法战争爆发的原因^②，讲了两个方面，一是“夙怨未平”，追溯到“五十年前……法君拿破仑第一将日耳曼诸国尽行征服”，以及后来法意、普意对奥战争后遗留的领土纠葛问题；二是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虽然在分析过程中所举的史实欠准确^③，而且也没有涉及推动普法两国发动战争的真正动机，但毕竟提到了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这条导火线。

接着，缕述了战争的进程，从法国对普宣战开始，一直到色当战败和拿破仑第三被俘，其中几个重大战役都提到了，对这场战争的过程作了概略的反映，然而，无论在日期上和事实上都有不少讹错。

这里面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对于国防政府成立以后直到巴黎公社起义这段期间的要闻的记载。

①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二，第三十一至四十一页〔87—98页〕。

② 同上，第三十至三十二页〔87—89页〕。

③ 例如，把1859年法意对奥战争和1866年普意对奥战争混在一起，说成是“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法助义大利（意大利）及德意志（德意志）征服奥地利（奥地利）国”，把西班牙女皇伊萨伯拉被逐而出现的王位问题说成是西班牙国“老王薨，因其天阍，虽有太子，究非己出，民以为耻”等等。

对于1870年9月4日共和国成立这一事件的记载是：“巴里闻各处失守，国君被俘，众议改为民政。遂于是日拟定各官：巴里提督代理营务；所选各部如吏部亢贝得（内政部长甘必大），户部皮格（财政部长皮卡尔），礼部席孟（教育部长西蒙），兵部傅罗（陆军部长勒夫洛），刑部柯梅（司法部长克列美），工部唐安（社会工程部长多里安），海部富立松（海军部长福里桑），商部马年（农业贸易部长马尼恩），外部发福尔（外交部长法夫尔）；外以冈北达（甘必大）为帅，内以屠额许（特罗胥）操兵，而民主执国政焉。”^①这大概可以算是中国人记载的最早的一份国防政府的名单吧！

对于10月8日由巴黎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组织的前往市政厅要求成立公社的武装请愿活动，则记载如下：“十月初九日，有戴红帽之乡勇十万，名为‘红头’者，齐赴外部，伪以击退德兵为名，欲藉改民政而作乱，遂调各部兵将击退之。”^②这里所说的“乡勇”、“红头”以及以后提到的“叛勇”，都是泛指国民自卫军和公社社员而言。在这则记载中，日期、人数、内容都有错误。特别是把这次正义行动的性质歪曲为“伪以击退德兵为名，欲藉改民政而作乱”，附和国防政府和资产阶级报刊的反动宣传，则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偏见。

对于10月31日起义和事后国防政府搞的全民信任投票的记载是：“三十一日……午后，有‘红头’数万，围守提督公署，声言要改‘红头民政’。延臣集议，示以翌日宣告，须通城人民保结，再为酌定。〔西历〕十一月初三日，巴里百姓保者五百五十万七千九百九十六名，不保者六万二千六百三十八名，改否未定。”^③

①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二，第三十四页〔91页〕。

② 同上，第三十六页〔93页〕。

③ 同上，第三十八页〔95页〕。

这里提到的“红头民政”即指巴黎公社，这可以算是中国人对巴黎公社的最早的称呼。数字方面，除将55万误为550万外，其余都很精确。

对于普军围城后巴黎的情况，也有所记述，包括捐铸大炮，食物供应，普军炮轰和法军出击等等。

10月初：“官出告示云：凡铺出售，皆依官价，不得多卖。如面包每斤三稣（苏）半，牛肉每斤一方（法郎）零一稣，羊肉每斤一方，猪肉每斤一方四稣。此数日内，凡穷人无依者，准其入城逃避而收养之。”①

10月下旬：“此时巴里城内集捐铸炮五百门。各家俭用，每日两茶一饭。一人只准买肉四两，其余猪鸭鸡鱼及干鲜菜蔬皆无。鸡蛋每个六稣。各村镇礼拜堂之铜铁器皿皆取以铸炮。”②

“十四日……将牛马骡驴猫犬鸽鹌纳官分卖，有定价。不论贫富，每人一两五钱，持牌领肉，而车无代步矣。又兵部出示招兵，无论何人，其有妻无子者，自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入队；有妻有子者，登埤守炮；无妻子者，二十一岁至四十五岁皆出战；其十七岁至二十岁，愿者亦可入营。此时共兵六十万，大炮三千五百门。”③

在记述法军出击方面，有一则记录显然是将10月21日法军在马尔麦松方面的突击跟11月28日杜克洛所指挥的以10万兵力向香槟尼进行出击这两件事混在一起，这则记录是：“二十一日，有将军瞿克欧（杜克洛）者，率兵十一万，带炮九十二门，分左右中三营，出城探德兵地势。其中营往阿侯驿麻尔梅松（马尔麦松）各村引战，自未至戌，彼此大炮喷炮，连放不止，法大捷。后遇德

①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二，第三十六页〔93页〕。

② 同上，第三十七页〔94页〕。

③ 同上，第三十九页〔96页〕。

救兵至，不得前进，乃各行缓退……。”^①从日期和内容来断定，应当是马尔麦松之战（该战役法军只投入6000人），而从提到的指挥者和兵力来看，则与香槟尼出击相符，然而那次战役是以法军惨败告终的。

有关普军开始炮击后巴黎的情况，则记述如下：

1871年1月6日：“城外西南山顶德筑大炮台十二，放大钢炮一百二十门，昼夜齐发，以攻炮台与城。兼放开花炮五六千于城内，大半落于思安江（塞纳河）之南岸，击死养济院中之病人无数。又一炮子落于女学院，幼女伤者六，死者五，其血肉飞粘四壁，惨不忍言。又轰天主堂数座，伤死男女老幼数十名。又烧毁楼房数处，大花园火树银花，牲灵园禽惊兽骇，诚为未有之浩劫也。按万国公法，应于未攻之前二日宣战，以便准备一切。今德未先通报，遽行火攻，殊属有背公法。”^②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对德军炮击巴黎的义愤。

1月15日：“巴里出示，每人只许吃面包四两，德兵至此，已围困一百三十三日，城内粮糗告乏，又因‘红头’反间，几有哗溃之虞。加以每日房宇崩坏，死伤相继，虽各省救援，亦皆败走。众议决一死战，以图保全于万一，亦不得已之举也。又巴里东北之山泥城，被攻五昼夜，每日炮子落于城内者，已积如山。”^③

1月21日：“巴里城内各营出战，自辰至酉，败绩回城，兵多逸去者。”^④

1月25日：“因巴里城内有一百八十万之众，而粮糗不足半月，廷臣集议，欲往德营乞和。拟停战二十一日，以便运粮。订

①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二，第三十六页〔93—94页〕。

② 同上，第四十至四十一页〔97—98页〕。

③④ 同上，第四十一页〔98页〕。